

董朝晖

潜心做好欢乐产业

本报记者 廉丹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说到欢乐传媒有限公司,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提起刚刚在东方卫视热播的喜剧类选秀节目《笑傲江湖》,很多人会会心地地点头。这档综艺节目是欢乐传媒经过3年精心准备重磅推出的,播出后不仅收视率强势飘红,而且在网络上获得极高点击率。

欢乐传媒成立10多年,恰恰是中国内地传媒业高速发展的10多年。从电视综艺节目、电视剧到电影,欢乐传媒在这个领域孜孜耕耘,而亲历行业高速成长期的欢乐传媒董事长董朝晖也在潜心经营他的“欢乐产业”过程中收获良多。

上世纪90年代末,欢乐传媒从制作第一部综艺节目欢乐总动员开始在传媒领域成长。当时,中国大陆传媒业市场化刚刚起步,老百姓的节目选择意识还只是初具雏形,第一批走传媒市场化发展之路的圈内人士也大部分停留在做电视剧阶段,没有人知道综艺节目到底该怎么做。

同宗同祖、同文同种,再加上当时台湾的综艺节目制作正值黄金期,于是,董朝晖带领他的团队赴台湾取经,并且一待就是半年。董朝晖回忆说,“我们当时走访了台湾的中视、华视,直接到人家的演播室里去看,发现原来节目可以这样录,主题竟然能这样做。”

从台湾回到北京,董朝晖挖来了

10年,从25万到9000万

华视13个做综艺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从制作总监到总导演都是台湾人的欢乐总动员制作团队。此后,欢乐总动员在全国数百家电视台周末黄金档热播、持续9年推出的成功,证明了董朝晖当初决定赴台取经的正确性,也为欢乐传媒在业内奠定了开疆破土的基础。

10多年过去了,经过快速成长期的大陆传媒行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观众对综艺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提起赴台取经的往事,董朝晖这样说,台湾的传媒业市场小,综艺理念多是从日本引进的。我们最初的节目制作受台湾影响很大,但随着大陆传媒行业的日趋成熟,这个广大的市场需要我们变化节目制作模式和理

念。观众现在更青睐大型综艺节目,我们不能停留在最初的浅层次娱乐形式上,要有更高的追求。

董朝晖举了个例子:“当初欢乐总动员的制作成本是25万元,而我们现在笑傲江湖的制作成本是9000万元。这些年反而是台湾的电视人开始羡慕大陆可以用这样的大手笔来做一档节目。”

“市场容量决定制作模式,笑傲江湖栏目在经过两年的精心策划后,2013年栏目组派出10多个团队,遍及全国30多个城市,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合适的参加人选。为了让节目更加精良,栏目组的编导们根据每个选手的个人特点,在已有创意上进行二度创作与包装。”董朝晖介绍说。

合作,从取经到整合

集中的结果。对此,董朝晖表示,香港在演员的规划培养方面有着成熟的运作模式,美工、造型、摄影等方面香港和台湾都有很精良的班底。未来,中国大陆传媒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资源整合式的发展已经成为未来的方向。

谈到现在香港、台湾传媒业人士北上发展,甚至把整个工作室搬到北京,董朝晖表示,未来这个市场将是主市场。这个市场的观众肯定要求看到更多与他们的文化更贴近、更接近的电影和节目。两岸三地的所有导演、演

员、制作人,创作时都要充分考虑这个市场观众的需求。港台业者到北京发展,应首先考虑如何融入这里的文化。

做传媒也要做好产品研发,无论是综艺节目、电视剧还是电影,好的创意点才是这个产业的核心,才能抓住市场需求。这是董朝晖10多年沉浮传媒业的感悟。“在日趋成熟的市场环境下,创新要从形式到本质,两岸三地的传媒业者要不断做出更多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产品,才能始终领先于市场。”董朝晖说。

就高雄燃气爆炸事件

大陆各界向伤亡同胞提供援助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台湾高雄发生燃气爆炸事件后,大陆各界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第一时间向不幸遇难的台湾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向受伤同胞及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介绍说,高雄发生的不幸事件,牵动着大陆同胞的心。据了解,卫生计生委通过《海峡两岸医疗卫生合作协议》渠道,询问伤员救治情况,表达了提供医疗协助的意愿。中国红十字总会决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捐款50万美元。中共宁波市委通过对口交流渠道捐款100万元人民币。在台湾投资的大陆企业纷纷表示将联合捐款。张志军表示,大陆曾发生过类似事故,有一定的处置经验,如台湾方面需要,愿提供相关协助。

青岛大港ECFA货物通关提速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闵雪莲报道:日前,山东烟台胜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向青岛大港海关申报进口23台台湾原产CNC立式车床,价值135.26万美元。仅用时6分钟,该票货物顺利通关,企业凭ECFA原产地证书享受税款减让48.77万元。这是海关总署新开发的两岸海关电子信息交换系统7月1日正式上线以来,该关验放的第二十三票ECFA货物,ECFA货物通关速度比系统上线前提高约20%。

今年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实施的第四年,青岛大港海关采取多项措施,保障ECFA商品通关顺畅。他们会同山东省贸促会、青岛市贸促会大港海关举行政策宣讲会,介绍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功能、ECFA货物通关便利措施等,现场解答企业问题;设立ECFA货物专用报关窗口,优先接受ECFA货物申报;对于鲜活、易腐商品实行提前报关和24小时预约报关,及时验放货物;鼓励企业积极利用预归类制度,方便企业快速通关。今年年内,青岛大港海关已累计验放进口ECFA货物5998吨,货值3119万美元,相关企业享受税款减让1668.2万元。

港铁参与重庆轨道交通发展

本报讯 记者陈硕报道:港铁公司与重庆市政府日前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参与重庆市的轨道交通及物业发展。根据该备忘录,重庆市政府将与港铁公司就市内一条或多条轨道交通线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展开合作洽谈。参考港铁公司的“铁路+物业”发展模式,重庆市政府欢迎港铁公司在符合内地相关法规和政策的条件下,在轨道交通车站及车厂发展物业经营。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港铁公司将成立工作小组,就轨道交通及物业发展项目展开洽谈。

据悉,拥有超过3000万人口的重庆是中国内地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亦是内地西部地区主要的交通枢纽。其现有的轨道交通网络总长约170公里,重庆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兴建一系列新线路,并将网络总长扩展至300公里以上。

深圳前海出台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办法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为适应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建设需要,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日前出台《前海深港合作区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办法》。

根据《办法》,前海深港合作区将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在授权权限范围内,对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且符合前海深港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实行备案管理;对属于外商投资企业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实行核准管理;对外商投资企业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及前海深港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规定以外及授权权限范围外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外资管理规定办理。



7月28日,几对夫妻在澳门美高梅酒店内拍婚纱照。当日,澳门美高梅酒店举办“天幕下之恋人”活动,为10对逾65岁的夫妇在酒店内拍婚纱照。(新华社发)

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莫纪宏

本报记者 周剑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一些认识误区作出了正面回应。近期,香港有些声音对白皮书中“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表述提出了质疑,认为香港基本法里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为此,《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莫纪宏。

记者:“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特别强调“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为何对该条款专门作出说明?“爱国者治港”表述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莫纪宏: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要求国家机构负责人和公务人员必须是本国公民。我国现行宪法从第52条到第55条详细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义务,其中,“爱国”是一项最基本的宪法义务。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主要政府官员,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强调“港人治港”要以“爱国者为主体”,这是主权国家对本国公民的最低道德要求。

保障义务,与此相应,公民必须向国籍国履行忠诚的法律义务,包括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服兵役和纳税等基本法律义务。公民如果只享有权利,不履行义务,那么主权国家就无法有效存在,公民的爱国义务可以说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构成要件。

1997年香港回归,为保证香港回归后社会、经济的继续繁荣,基于“一国两制”原则,我国通过全国人大制定香港基本法的形式,赋予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的自治权,并且也规定香港居民依据基本法享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基本法可以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必须履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因此,“爱国”是具有中国籍的香港居民首要的宪法义务。由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爱国”义务必然包含了“爱港”义务。

对于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来说,除了承担“爱国”义务之外,还应当比普通公民遵循更加严格的程序来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这是宪法和法律对公职人员的特殊要求,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会作出此类明确规定,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的“爱国”宣誓制度和履职承诺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保证让素质更

高的人来担任公职,更加有效地履行国家公共管理职能,更好地为全体国民服务,维护国家的繁荣和稳定。

记者: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日前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政改报告中,认为“社会大众普遍认同行政长官人选须‘爱国爱港’”。这是否意味着,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探讨,香港社会已经就该项表述形成主流民意?

莫纪宏:梁振英行政长官提交的报告是理有据的。梁振英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基本上反映香港各界的意见和看法。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咨询期间,特区政府共收到约124700份来自不同团体和个人人士的书面意见,同时必须履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因此,“爱国”是具有中国籍的香港居民首要的宪法义务。由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爱国”义务必然包含了“爱港”义务。

记者:白皮书中提出“中央对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权”,这一提法是否超出了香港基本法的相关表述?

莫纪宏:全面管治权没有超出香港基本法。因为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于全国人大的授权,故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完全“从属”于全国人大的“授权”的,没有授权,就没有自治权,故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像

有些联邦制国家州所拥有的“剩余权力”,只能在授权范围内实现自治。由于中央与香港的关系是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授权者当然可以全面管治被授权者的“被授权行为”。

白皮书提出的全面管治权与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没有任何不一致,更不是一个新创造的说法,只不过是法律的语言对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的一种综合和概括,也是中央政府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表明的一种态度、立场、认识和看法。首先,所谓全面管治权是主权意义上的,主权是不可动摇的,包括国防、外交,是全面管治权的基础。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制度是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来规定的,香港基本法的制定权和修改权都掌握在中央,管治应该有更广泛的内涵,不仅限于国防、外交,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综合体,是国家治理的完整表述,这里既包括立法权、行政权,也包括司法权,只要是国家权力,它都包含在全面管治权里面。立法权方面,基本法的制定、修改都是由全国人大来行使。行政权方面,行政长官是由中央政府来任命的。司法权方面,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